

以社區發展解決環境問題： 論社區環保鐵三角模式

王俊秀

壹、前言

「國」常大得無法解決小問題，而「家」又小得無法解決大問題（Næss, 1989），社區承上啓下，正是最適當的功能空間。「社區」這個名詞用在人類聚落（human settlement）之前，早就以「群落」之名用於生物界，因此素有「生態」取向的傳統，並具有「空間細胞」的雅號。用於人類聚落之後，更兼具「社會」取向，常被認為是「大都市中的小村莊」（Gans, 1962）。由上可知，社區為一種社會生態的空間，最適合從事社會防衛及社會動員。由於環境污染已成爲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富裕中的貧困」現象常常可見，「家」是一個污染源乃爲不爭的事實，家的「堡壘化」也無濟於事（王俊秀，1993a），因此在「全球性思考，草根性行動」的理念下，社區作爲「家」的組合，乃理所當然成爲環保行動的最適「力場」，也是最小的「環境自治體」（須田

等，1993）及風水圈（王俊秀，1994b）。本文由社區發展與環保的辯證關係出發，進而探討社區環保鐵三角模式來作爲社區發展的一種策略以解決環境問題。

貳、社區發展與環保的辯證

社區發展是一種組織與教育的行動過程（徐震，1988），其中組織過程包括了參與、研究及動員；教育過程則包括了自助、合作及自治。而由社區發展週期（community development cycle）來看，初期大都由社會運動的方式開始，長期則將初期的議內化成爲生活方式而形成一種教育及行動的過程。特別是環境環保運動所視爲中心綱領之前述「全球性思考，草根性行動」最常落實於社區當中。換言之，社區發展透過其組織過程而促進環保社會力，更進而藉其教育過程而鞏固環保地盤。而進而言之，社區發展與環保互相形塑，具有「再

生產」的功能，因為環保工作的特殊性格亦有助於產生更好的社區發展模式。

由都市居民的社會心理特質亦可用來探討社區發展與環保的互動關係。傅仰止（1994）由分析公私場域的觀點來探討城鄉的差距。都市人在私場域（家庭、親密朋友等）中和鄉下人無甚差距，但在公共場域中則有另外一套冷漠相待的互動模式（Lofland, 1973）。此種人與人互動的冷漠模式也導致了公共場域中的寂寞孤獨感（章英華，1988），更進而孕育出容忍異己的心態（傅仰止及伊慶春，1994）。此種心態由人與人的互動推及人與環境的互動而導致了容忍及姑息污染的結果。

雖然個人社區（personal community）——強調跨地理範圍的社區關係以及因異質網路（heterophily）而成的社會圈（Simmel, 1908）——在都市化高的地區有其存在的背景，但也因此公私場域的界限也會趨於模糊。換言之，都市人暴露於公共場域的機會過多，惟有消除或減少公共場域的陌生性或創造私有化的公共空間（privating public space）方式以解決其調適問題（熊瑞梅及吳文瑄，1994）。

在此種「公私不分」的情況下，社區的角色因而凸顯出來，一方面社區是公私場域間的「緩衝場域」，即由「冷漠」進入「親密」的過渡區。再則基於前述「創造私有化空間」的理由，社區乃成爲「家」的延伸——更大的家。另一方面，基於「功利性道德」的考量（黃光國，1988），「遠親不如近鄰」的功性能已多次於都市中展現，在 Wellman（1979）探討三種社區關係；社區失落論、社區繼存論及社區解放論，環保作爲社區發展的催化劑，有助於支持社區繼存論及社區解放論。由於污染的無時不在及無處不在的特性（王俊秀，1991），對抗公害的威脅已不是「關上鐵門」就可應付，組織性不滿（organized

discontent）必須透過社區方足以達到關鍵數，作爲一種最小的「環境捍衛規模」，社區居民乃有被「團結一致」的趨勢，而此即具有社會運動（特別是資源動員論）的性格而這也是環保促進社區發展的另一面相了。

參、社區環保鐵三角模式

爲了遂行社區的環境守望（environmental watch），本文嘗試提出環境鐵三角模式來作爲社區發展的策略以解決環境問題。本模式起源於區位三角形；人、空間及活動（Tilly, 1974），再結合防禦空間（Newman, 1972）的概念而成，共有三組概念：環境侵略/捍衛人口；環境侵略/捍衛空間；環境侵略/捍衛活動（王俊秀，1993a），此模式可視爲「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策略。縱觀工業化及現代化的潮流，成長典範（development paradigm）一直蔚爲主流，此典範強調：人定勝天、成長沒有極限、人爲萬物之靈等。直到「大地反撲」，人們才警覺到「沒有環保爲基礎的成長是最大的破壞」，「牛仔式」經濟發展模式受到質疑。因此環境典範（environment paradigm）逐漸興起。此典範強調：天人合一、成長有極限、人爲萬物之一支和其他生物平等相待。已發展國家基本上已由成長典範轉移至環境典範（Milbrath, 1984）。台灣則正在半途上，即已由成長典範出發但尚未到達環境典範（蕭新煌，1986）。而爲達到環境典範的策略中，由綠黨主張的「綠色原則」具有代表性。這四大原則爲：草根式民主、非暴力原則、生態思想及社會責任。這些原則和社區發展並無相悖之處，反可相輔相成，其中 Neess（1989）所提倡的綠色社區（green community）更落實「上述諸原則，此種由下而上（bottom-up）的社

區發展策略為促成典範轉授的重要因素。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環境侵略/捍衛人口：「人不一樣，環境會走樣」正是環境侵略人口的寫照。由台北市民政局（1992）的調查中得知台北市民最感興趣的休閒活動是卡拉OK及看電視，更可證明人與自然的疏離已擴大層面。何況環境侵略人口與環境受害人口為一體的兩面，例如高雄都會區的肺癌患者趨於年輕化：6歲以下佔7.1%，顯示空氣污染及吸菸為主要原因。而衛生署統計的260萬吃檳榔的人口（紅唇族）在某種形式上未嘗不是環境侵略人口。再則政府對於汽機車的成長未能有效管制，以致也直接鼓勵更多的駕駛人成為環境侵略人口而形成「污染共犯結構」。

在意識、知識及行動三階段上，「知行不一」的現象也是解讀環境侵略人口的指標之一。環保署（1992, 1993）委託蓋洛普所作的兩項調查可用來說明此現象。一項「綠色行銷策略調查」指出九成以上的民衆意識到台灣環境問題的嚴重。但只有69.5%的人願意主動購買綠色商品。另一項「環保績效民意調查」發現對環保「關心」的民衆由1992年的92.7%上升至1993年的94.5%，而民衆環保常識的平均得分只有34.5分，而環保行動平均為64分。王俊秀（1991b）曾於新竹市調查環境破壞人口（EIP）的區位分布，指出30-39歲高中高職學歷者之男性，職業為小老闆或中下主管者有忽視環境的傾向。上述之環保績效民意調查也指出：最不願動手作環保的民衆為20-29歲，居住於中部及南部者。而社區作為「沒有圍牆的教室」正是減少環境侵略人口而培養更多環境捍衛人口的「好所在」。人雖是環境污染的受害者，正好也是製造者，基於此種「污染共犯結構」（王俊秀，1993a），要解構它也必須由始作俑者的人下手，而社區的社會控制力正是重建「環境倫理」的適當場所，社會學中所謂的

「關鍵數」也較容易於社區中達成。換言之，環保種子（例如環保媽媽，環保小尖兵等）透過社會學習效果，在社區中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如再加上匿名性的改善，則將易於達成環境守望目標。

傅宗懋（1992）一項有關台北市社區守望互助的研究發現：72.43%的受訪者表示未與鄰居來往或少來往，這個數據和主計處（1992）的一項全國性研究結果（55.1%未或少與鄰居往來）一起比較之下，可見都會區的鄰里關係確實不活躍，但值得注意是一方面88%的都市居民肯定社區守望互助的功能（傅宗懋，1992），85%的民衆願出資改善社區環境品質（研考會，1992）。另一方面各種功能團體及社區的「新三姑六婆」漸漸取代左鄰右舍，熱心公益，增加了社區居民的向心力。其中社區環保媽媽的角色更扮演了社區環保地盤建構的催化劑。

前述之典範轉移也當然會增加更多的環境捍衛人口，除了精英環境主義（*elite environmentalism*）的特定族群及上述之環保媽媽外，在污染環境中成長的新人類（*post-industrialization kids*）也形成另一環境捍衛族群。由傳播學的魔彈理論（*Magic Bullet Theory*）中得和，環保宣導及教育的效果與年齡成反比，由於學童對於此類宣導，未有「防彈衣效應」，故效果甚佳，並因此產生「由下教上」的連鎖效應。

(二)環境侵略/捍衛空間：社會建築家們一再指出：硬體的規畫可多少減少社會治安及污染的死角，但空間使用者「無意識」、自我家畜化及堡壘化最容易造成「空間淪陷」。換言之，室內裝潢雖豪華舒適，鐵門外卻是一片荒蕪。再則中國人習慣於「下舖上住」的生活方式，甚至還沿襲著「客廳即工廠」的舊俗，因此有限的空間意圖創造無限的功能，不相容性更是大大增加。例如，

住宅區內或公寓大樓內設神壇或卡拉OK等，即形成嚴重的噪音公害。王俊秀（1993b）使用部表情法來評估台灣七大都市的環境狀況，由研究的初步結果看來，都市越大，環境要「快樂」起來越不容易，「承載容量」超載的程度常抵消環境管理的成果。但是這不意謂著小都市較易展現「快樂的容顏」，因此端賴「環境規模」（environmental scale）的建構方能決定一個都市是否最能展現「歡顏」，而免於陷入環境迷亂情境（environmental anomie）。

由於都市環境情況在國內的變化太快，因此「環境退化」的現象相當普遍，不管這七大都市的「表情」如何，總而言之，退一步者有：台北、高雄及新竹市；退二步者為嘉義（由快樂到悲傷）；長悲型者為台中市；進一步者只有台南市。顯示出現行都市的環境管理仍在治標階段，要解構此種現象，退而求其次由「社區」作起恐勢在必行。

由於污染早已是生活的一部分，退入家中也只是「治標」，人們更需要社會互動及互助（徐震，1980）。治本的第一步乃是踏出家門尋找另一個更大的家。因此，社區最容易變成「家的延伸」。目前流行的不要在我家後院（NIMBY）情結（Freugenberg, 1984），解構之道之一乃是將社區變成最適當的後院（BABY），即先由「視社區如家」開始，配合相關的環境守望措施，則方能建構環保地盤（王俊秀，1993a）。經過多年的嘗試及動員，台北市已有許社區組織了環境及社會守望的工作，由早期民國七十二年台北市大安區臨江街住戶聯手將色情趕出住宅區後，保衛社區及家園的案例及組織就風起雲湧，Gans 所言之「都市中的小村莊」在台北市的社區中一再展現。靠著上述的環境捍衛人士（新三姑六婆、環保媽媽等），社區環保地盤的建構有一定的成果，例如三犁社區、綠大地社區、雙和社區、民生社區、大直社區等。

（三）環境侵略捍衛活動：如果將社區視為一個「染缸」，則各種環境侵略捍衛活動為「染料」。由於前述之各種「人情砂漠化」、「空間廢墟化」及「交通反活化」等之緣故，各種環境侵略活動因而乘虛而入，例如色情業進入住宅區，以及垃圾包圍社區等。又如交通「反活化」也造成污染。交通活動本為促進活力、加速互動，「每個人有車等於每個人沒車」，形成特有的塞車文化。台北市的汽車族每天浪費1小時45分於塞車上，而通勤學生則每天花費1小時12分的於上下學的路途上（教育部，1993）。而不論是乘公車或騎機車上學的學生，在交通尖峰時間，曝露於大氣中揮發性有機物質（VOCs）濃度為美國洛杉磯市的三至八倍（詹長權，1992）。尖峰時刻台北市常被稱為「全世界最大的停車場」，塞車時造成的社會成本以外，其所形成的空氣污染更讓每個人「無所逃於天地間」。

針對各項侵略活動展開的「社區防衛」即為環境捍衛活動的開端，消極性如社區巡邏及逐戶宣導等，積極性者例如社區環保會計系統的建立一包括垃圾減量、跳蚤市場及集體購買等。由於環保政策的走向轉而「由下而上」（Bottom-up），諸多的環境捍衛活動因而興起，而且把社區作為主要的標的。一九九一年內政部擬定「社區發展方案」致力於下列三項目之推動：公共設施及環境管理、社區福利、社區認同感，並在台北市選了三個示範社區。同時，台北市環保局也成立了社區環保義工大隊或環保天使來推動各項環保活動。同年環保署也開始推選全國十大環保社區，而負責各種垃圾回收的基金會也舉辦了不少宣導活動。主婦聯盟所訓練的環保媽媽也歷經七期，約有140人，已分布在台北市各社區中從事相關的環保活動。例如有七千戶的大直社區結合附近四所學校所作的資源回收活動，以每週1700公斤的回收量不但建構了環保地盤，

也促進了親子間及居民間的感情。隨著跳蚤市場的流行，綠色消費及惜福觀念也在社區開始生根，例如北市西門地區所辦的「溫馨交換情」活動。另外民生社區也組成「綠色小精靈」服務隊，從事「讓生活有綠」的活動。為了社區活動的整合，由民生社區號召而成立了「社區資源交流協會」也開始運作。而第一個以環保精神為經營目標的潭乾社區合作社，也於一九九三年七月由主婦聯盟及永的家庭主婦們於永和成立，推動「共同購買」的活動。此種捍衛活動的展開當然有助於鞏固環保地盤，甚至會擴大其「後院效應」使得周圍的地區也有所改變（Cox et al., 1987）。

肆、結論

社區的重生是一種生活方式改變的全民運動，社會治安敗壞將導致社會死（sociocide），環境污染將導致生態死（ecocide），社會及環境守望一方面使得社區有了「呼吸」及「脈動」，另一方面更是對GNP = NT（黑槍）+ NP（污染）的挑戰（王俊秀，1993a）。環保的基礎學科為生態學（ecology），其語源的oikos本為「家」之意。蓋亞假設謂：地球就是一個家（Livingston, 1983），因此環境管理為家庭管理的延伸，而家庭管理為人性管理的延伸，「社區」最人性化且最能整合「家」的力量而用之於環境保護上。

參考文獻

- 王俊秀
1991a 公害申訴專線的分析及評估，新環境基金會
1991b 「社會擾流的理論與調查：環境管理的社會學分析」，第四屆環

境規畫及管理研討會論文集：259-278。

1993a 「環境主義是都市的生活方式：社區環保地盤的建構」，中西都會區之發展與面臨問題研討會論文集，中研院歐美所。

1993b 「臉部表情法及都市環境診斷：台灣七大都市的個案研究」，台大城鄉及建築學報，（7）：53-63。

1994a 「公害認知地圖與垃圾考古：社區環保行為的考察」，環境教育刊，5月號。

1994b 「風水圈與變形蟲理論：試論中國式環境規畫及管理的空間極相」，中研院民族所集刊，（已被接受）。

台北市民政局

1992 台北市民參加基層藝文活動之意向調查報告。

研考會

1992 台灣地區國民生活型態與倫理調查報告。

徐震

1980 社區與社區發展，台北：正中。

教育部

1993 各級學校通動學調查報告，教育部統計處。

黃光國

1988 義務性道德與功利性道德：台灣社會中的道德判斷及其相關變項，於楊國樞、瞿海源主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頁159-194，台北：中研院民族所專刊。

章英華

1988 都市化與機會結構及人際關係態度，於楊國樞、瞿海源主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頁159-194，台北：中研院民族所專刊。

傅仰止

- 1994 「台灣都市居民的社會心理特質：由公私場域檢視心理狀態和社會互動」，中研院民族所小型專題研討會系列之12：台灣都市的政經結構與社會心理。
- 傅仰止 伊慶春
- 1994 容忍態度的結構肇因：都市背景、遷移經驗、異質網路。
- 須田春海等(編著)
- 1993 環境自治體，東京：學陽書房。
- 傅宗懋
- 1992 台北市社區守望互助對犯罪預防之影響，台北市政府研考會。
- 詹長權
- 1992 台北地區通勤者 VOCs (揮發性有機物質) 總暴露量研究先驅計畫，台大公衛所。
- 熊瑞梅、吳文楨
- 1994 「台中地區居民網路：公與私的地方關係」，中研院民族所小型專題研討會系列之12：台灣都市的政經結構與社會心理。
- 環保署
- 1993 環保績效民意調查，蓋洛普公司。
- 1992 綠色市場行銷策略研究，蓋洛普公司。
- 蕭新煌
- 1986 「新環境範型與社會變遷：台灣民衆環境價值的初探」，台大社會學刊(18)：81-133。
- Cox, F.M. (et al.)
- 1987 Strategie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Iascarn III: F. E. Peacock.
- Freudenberg, N.
- 1984 Not in Our Back Yard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Gans, H.H.
- 1962 The Urban Villages, New York: Free Press.
- Livingston, J.
- 1985 "Moral concern and the Eosphere", *Alternative*, 12 (2): 43-47.
- Lofland, L.H.
- 1973 a world of Stranger: Order and Action in Urban Public Space, New York: Basic Book.
- Naess, A.
- 1989 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sty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 Press.
- Milbrath, L.
- 1984 Environmentalists: Vanguard for a New Society, Albany: SUNY Press.
- Simmel, G
- 1908 "Group Expans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ity", pp. 251-293 in D.N. Levine (ed.) *George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 Tilly, Charles
- 1974 An Urban World,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 Wellman, B.
- 1979 The Community Question: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5): 1201-1231.
- (本文作者現任職於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